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

任 继愈

一

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有五千年，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却只有三千年左右。因为人类从蒙昧到有文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有文化到自觉运用高度抽象思维，则需要更长的路程。哲学思想是文化的精华部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世界上文明古国不少，各自走过了自己的道路，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但大体上都是从蒙昧到有文化，从有文化到产生哲学这样的普遍过程。

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它也有从幼年不成熟到逐渐成长的过程。一个人的有效寿命不过百年，一个民族的有效寿命要长得多，以一百年到一千年为计算阶段，才可看出它发展变化面貌的来龙去脉。

中国哲学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五四”前后的学者们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以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哲学课程为例，“五四”以前，从三皇五帝、《尧典》、《舜典》讲起，讲了半年，还没有讲到周公。“五四”以后，学术界多数研究者吸收了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利用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吸取欧美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断然抛弃了缺乏事实根据的传说，从春秋战国的诸子争鸣讲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一代风气，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此后的中国哲学史再没有从尧舜讲起的。再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哲学与西方古希腊哲学比较，双方兴盛时期东西方相辉映，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几乎同步前进。[1]从世界范围考察，公元前七世纪前后人类进入文明成熟阶段，产生了哲学体系。东西方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越到后来，差别越明显。

中国哲学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二千年的许多流派和观点、哲学的基本范畴，大体都能回溯到春秋战国。学术界多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一则内容丰富，二则学术争辩空气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到了秦汉统一全国，学术界反倒显得沉闷，不及先秦学术活跃，有人对此感到遗憾。

如果把先秦哲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不难发现，从先秦哲学的百家争鸣到秦汉哲学的定于一尊，这个变化是必然趋势，不可分割。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什么争鸣？他们争论的中心议题是什么？先秦百家争鸣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孔、墨、孟、荀、韩非都提出了他们统一天下的方案，都不满意当时战争频繁、政治不安定的社会状况。貌似超脱的老子、庄子，也设计了他们治理天下的蓝图，并不是不要统一，只是要上边有一个“圣王”以无为原则治理天下，结束混乱局面。先秦的百家争鸣只是为后来的中国哲学创建完整的思想体系打基础，先秦哲学仅仅是中国哲学正式登场的序幕。真正具有强大创造力、生命力，足以体现中华民族伟大性格的哲学体系，都出现在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

今天世界关心中国哲学的人士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多种思潮和流派，仔细追寻，几乎都是指的秦汉以后的哲学和流派。各流派虽可以追溯到先秦，但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哲学的内容，几乎都是生存或流传于秦汉以后，经历隋唐或宋元明清专家学者发展出来的新体系。比如人们关注最多的儒家，号称以孔子为代表，

按其所指，多是汉儒、隋唐儒，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受过佛教、道教洗礼，经过宋代改造过的程朱儒、陆王儒，并不是原始的孔子儒、孟子儒、荀子儒。

二

中国古代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一面镜子。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其它文化体系发生联系，并引起注意，是秦汉以后的事。秦汉统一中国以前，中华大地上，众多诸侯国林立，国家小，人口少，不能形成集中凝聚的力量，各国战争此起彼伏。秦汉开始，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其活动范围基本上以黄河及长江流域为中心，由中原地区向周边辐射。繁衍生息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众多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了自己，壮大了群体。

秦汉统一，奠定了此后二千年的政治格局。二千年间，不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举国上下已取得共识，认为国家统一是正常的，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2]

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各个朝代，虽然思想不及先秦活跃，但哲学问题钻研得较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映时代特征的哲学思想体系。再从人民得到的实际利益来看，大一统的集权制度对于治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绝对优势，为历代朝野上下所接受。

历代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不断总结经验，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及时调整政策，构建理论，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史学。中国古代哲学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它是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人生价值论的复合体。中国古代史学范围比今天的史学范围广泛，它包括政治哲学。

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小农自然经济，它各自独立，一家一

户为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分散经营，相互隔绝。小农自然经济本来不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大国。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主要靠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政治的高度集中、经济的极端分散，这两者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了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

强化政治统一，不能专用武力，要文武相辅，才能相得益彰秦汉统一后，全国广大地区以政治手段推行了文字统一（书同文），从而克服了中国广大地区方言隔阻给中央统一政令推行所带来的不便，汉字把广大地区的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秦汉推行“行同伦”的教化措施，不像“书同文”那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但它起着更深刻的社会影响。它向中华民族系统地传授共同的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像“三纲”、“五常”原则，秦汉以来成为二千年间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违背了“三纲”为不忠、不孝，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夷夏之辨”是中国判断文明先进与野蛮落后的界限。区别夷夏的标准，把文化体系放在重要地位。

秦汉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历史通过秦始皇、汉刘邦的个人贪婪野心推动了社会前进。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这个论断是比较深刻的。

三

秦汉以后，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儒、道两家影响最为深远。儒家以孔孟为代表，道家以老庄为代表。孔孟老庄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时间最久。事实上儒道两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改变一次，都要适应当时的历史需要改变一些旧观念，增加一些新内容。人们常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二千年（或说老子思想影响了

中国二千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不得不辩。

儒家思想在汉代经政府推广，定于一尊，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吸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燕齐方术及黄老刑名之学，构成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汉代神学经学，末流发展的谶纬经学。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汉代神学经学，适应汉代大一统的思想要求，用它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论证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秩序，起了积极配合作用。汉代的神学经学成为汉武帝政治措施的得力助手。以其粗陋的神学理论基本上可以回答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问题。董仲舒的儒学所起的作用超过了孔子在春秋时期所起的作用。孔子影响所及只限于东方，董仲舒的儒学遍及全国。

儒学到了宋代，又经历了一次大变革、大改造。朱熹以毕生精力创建并完成儒教。重新选定《四书》为儒教经典，《四书》取代了《五经》的地位。经过元、明、清三代继续推广，《四书》列为科举取士的教材，朱注的观点规定为标准答案，应试者只能“代圣贤立言”（应试者体会《四书》中的观点来做文章，不得发挥个人的见解）。经过数百年的长期传播，反复灌输，儒家学说收到奇效，进一步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三纲”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宋以后有弄权的奸臣，没有篡位的叛臣，有效地消灭影响中央集权的叛逆行为。曹操在唐以前名声还不坏，宋以后曹操成了奸臣。曹操定为奸臣叛逆，完全是按儒教的标准划定的。

与儒家长期并存的道家也有类似情况。汉代道家是经过黄老学派洗礼的道家，以黄老刑名为主，吸收齐地管仲学派，杂收阴阳、名、法、儒、墨之学，构建了新体系，虽也称为“道家”，但与先秦的老子、庄子不同道。经过华北黄巾起义及四川五斗米道的农民运动的改造，《道德经》五千言成为道教徒用来讽诵、消灾免罪的圣经，老子也成为半人半神的教主。这是老子生前万万没有料到的。“汉儒”不同于孔孟，“汉道”也不同于老庄。学术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不能不注意这种名同实异的变化。

魏晋道教发展成为中国型的系统宗教（不同于原始宗教），与佛教争高下，并得到有关帝王、贵族的支持，列入官方宗教。道教对下层社会的群众采取符咒治病方式，扩大了信徒团体。宋明以后的道教及时吸收佛教的心性之学，配合儒家的纲常名教观点，向两个方向发展：宗教理论专注于心性修养（道教称为内丹），其宗教实践专注于炼丹、修仙，以吸引上层贵族，炼气、武术，传播于社会下层，形成众多流派。

从名称上看，秦汉以后的中国哲学流派来自先秦，但考察其实际状况，不难发现其时代新内容，招牌未改，陈列的商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换。这一普遍现象值得引起每个关心中国哲学发展的研究者的重视。

四

秦汉建立起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长期的改进，不断得到完善，遂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固定形态因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充分调动了人为力量，发展了小农经济可能达到的最大效益。统一大国给古代中国带来的利益，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显而易见，这些利益都不是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下所能办到的。

第一，消灭了内部战争。战国时期无年不战，统一后，可以百年不见兵戈 。这是小农自然经济切盼的太平日子，有利于发展经济，充实国力。

第二，广大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要有全面规划，小国治水以邻国为壑，而不能考虑全局利益。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统筹规划，有利于生产的提高和国力的增强。

第三，自然经济本身不利于经济上互通有无，在国家统一领

域下，南方的茶、木材，海滨的盐，北方的铁业，由国家经营，利及全国。小农经济除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外，所余无几。由国家集中赋税，集中调集人力（劳役），可以聚少成多，从事宏大工程建设，如国内交通、驿站、运河开凿、大型文化建设、大型图书编纂等，都是发挥了综合国力的优势，这种综合国力优势在抗击外来侵略、克服自然灾害方面，功用尤为突出。

第四，书同文的文字工具，行同伦的道德规范，形成了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第五，有安定的环境，增强国际交流，扩大民族视野，吸收友邦有用文化。

为了从理论上支持这样一种现实，从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到宋儒建立形成完整的儒教体系，都集中研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先是完善制度，如秦不分封子弟而速亡，汉分封子弟而招乱，经过长期反复，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中央集权的制度。

秦汉到隋唐的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探究如何完善中央集权制度，宋元以后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如何巩固这个制度，使之尽可能做到自身调节，使之长治久安。这项任务，经过无数哲学家、思想家的建设性的创造（制度的、思想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为了政治上的统一，中央必须高度集权，带有强制性，用法律、军事等手段辅助中央集权。集权过头，超过农民所能承受的限度，就会激起农民的反抗。秦和隋这两个短命王朝，都亲身尝到了集权的利益，也遭受到过度集权的失败。中国古代哲学不断出现的“无君论”“桃花源”，反映了小农经济的本性，向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天灾、战争，更无力抵抗外来强大的武力侵略，它要求有一位圣王君临天下，为民作主，保民平安。

由于这种相互需求、相互对抗的关系长期起作用，中国哲学历代相传的“内圣外王之道”、“究天人之际”的中心内容，说到

底，即如何协调政治高度集权、经济极端分散这对矛盾的学问。从董仲舒到宋代理学，进行了长期探索，最后找到了行之有效、比较完满的理论——《大学》。

《大学》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个体农民、小生产者在大一统国家的地位责任，提出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道路，对内心修养方面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内圣”功夫，从而把小农经济和天下、国家有机地结为一体，《大学》本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唐代韩愈重新提出，开始接触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散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宋儒对之进行了重新阐释，增加了新的涵义。朱熹的哲学体系，以格物说为起点，王守仁的哲学也是从格物说起步。在政治统一、经济分散的总格局下做文章，构成了秦汉到明清哲学史的主旋律。

五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哲学，哲学是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是中国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随着时代的前进，思想体系也有着相应的变革和演化。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文化现象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文化的继承与积累现象。文化的变革不同于政权转移，新旧之间不能割断联系。新文化都是在旧址上建造的。好象长江大河，导源于涓涓细流，下游汪洋浩瀚，下游水包含上游水。如中国古代诗歌，从口头文学到作家创作，先有四言，后有五言、七言，再后有律诗、都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有了七律，并没有废弃四言、五言。先用古文，后用白话，白话兴起，文言并未消失，它还保留着古文中有生命力的成分。有时忽略文化的继承与积累现象，过去曾经过分强调新旧哲学之间的对立，此种失误，应引为教训。

第二，文化衰减与增益现象。任何学说，都是当时当地的产物，时代和环境发生了改变，思想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失去了市场。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理论上也没有不变的成说。屈原的作品为不朽之作，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它的感染力也在衰减。汉初贾谊读到屈原的作品，为之叹息流泪，以至忧郁成疾，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也能赏析屈原的作品，但读后为之感动流泪的情况想必不多；杨墨之言盈天下，今天社会上知道杨墨为何许人的已很少；庄子为文汪洋恣肆，现在真正读懂庄子的人并不多，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代思想在后人眼里，其价值是经常改变的。历代都有人对其价值已衰减的思想及文化产品不断加以新的解释，注入新义，使它重新焕发活力。这就是文化的增益现象。一种思想或学说，脱离开它生存的时代环境，其价值势必衰减。后代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不断对之进行新的解释，增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新学说从旧的学说发展而来，但已不同于原来的面目。古人“以述为作”，实际上是以述代作。

第三，文化的势差现象。两种不同的文化相接触，总是文化层次高的一方影响文化层次低的一方，文化层次低的一方则处于受影响、被改造的地位，而不能逆转。元朝灭亡了宋朝，但这只是政权的转移，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原地区文化不但没有被消灭，新朝的统治者反倒受了它的同化，宋朝的儒教文化完全被元朝继承，并在更大范围内予以推广，明对清也有类似情况。如两种文化层次高低大体相当时，双方则呈现对峙状态，互相吸收交融。古代中印文化相接触，佛教传入，经过长期对峙、融合，才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西方基督教三次传入内地，都不能立足，但同一个基督教在传入云、贵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后，很快收纳众多信徒。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文字，社会结构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对较高层次的基督教文化的抗拒力较差。

第四，文化的融汇现象。文化不是死的东西，它有生命，有

活力，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文化相接触，很快就会发生融汇现象。处在表层的生活文化（如衣食器用等），很容易被吸收，处在深层的观念文化（如哲学体系、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才有可能发生交融。中国人对西方的哲学、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哲学有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了今天的水平。今天我们能够把两者融合会通，并创造出新的文化成品，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融合，这种融合只有在双方都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伟大民族间才有可能发生。古代的中印文化融合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西文化融合，都是如此。

六

从以上文化发展的一般现象，我们可以对中国哲学的未来面貌作一概括性的推想。

中国哲学的成熟发展并取得世界的关注和重视，都是在秦汉以后。如果中国哲学到春秋战国为止，没有以后二千年的补充发展，中国先秦哲学就只能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就如同古巴比伦的楔形文书一样，它不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也不会对后来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实际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哲学在此后的两千年间曾指导着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以至家庭生活。它是活着的意识形态，曾经长期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支柱， 屹立于天壤间。

进入近代,中国已不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 天朝大国 ”,而开始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哲学涉及的范围，已不专属于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的世袭领地。今天的中国哲学领地，闯进了外国众多的“ 孔孟老庄、程朱陆王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原有的封建主义哲学相撞击，必然会产生新的效应。认真总结中国

哲学几千年所走过的道路，使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形成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根据以往文化现象的几种表现，可以帮助我们推想今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形势。

中华民族的新哲学必然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抱残守缺，用古老的封建思想体系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的做法固不可取，而忽视文化发展的继承和积累现象，割断新哲学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这种态度也是轻率的，有害的。文化建设从来没有暴发户，今后也不可能有。中国哲学的新局面不可能建立在一片空地上，它必然是在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前进，注入新的血液，赋予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古人“以述为作”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有些过时、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要大胆弃置，任其衰减；对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则放手拿来，及时取用。

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新哲学的建立，不但应当包容古代哲学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优秀成果，也要广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主动吸收一切先进哲学体系来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先进的文化层次，建立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先进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文化的融会现象，是一切文化交流进步的总模式，也是未来中国哲学要走的道路。今后的中国哲学不限于出自中国学者头脑的哲学思想，应当承认凡是在中国生了根，发生了影响，为中国哲学所用的哲学和意识形态，都可以用来嫁接、移植在中国哲学园地，都是中国哲学。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当年佛教初传入时，曾被当作夷狄之教，遭到排斥，后来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佛教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和本体论，宋明理学得以超越前代，推动中国哲学前进，主得力于佛、道二教的资粮。

当代其它西方哲学重要流派传入后，经过系统传播，为中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术界所吸收的，如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的著作，也将视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我国现代老一辈哲学家中，如欧如竟无、熊十力、贺麟、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方东美的思想都超出了中国传统哲学范围，不同程度地吸收西方某些哲学体系和观点、方法，他们的哲学思想都属于正规的中国哲学。

由此上溯到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的哲学家，如康有为、谭嗣同及稍后的严复、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因时代较早，他们移植或偷运西方思想的痕迹宛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正规的中国哲学。谭嗣同在说明他的哲学体系所根据的思想资料时，曾列举：

>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谭氏的哲学融会了西方的宗教思想、自然科学、社会学及佛教哲学，更主要的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学和理学为主干。谭氏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生面，他建立起的哲学体系，尽管粗浅，有强扭硬接痕迹，但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学术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中国哲学前进的必由之路，中国哲学的未来，必须以现代科学、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构架新体系的主干。

七

中国哲学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发展的历史。中华民族，从秦汉到现在，做出重大贡献，或者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把分散的、诸侯割据的列国，拢成统一的大国，把众多的民族，融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中

国所以有今天，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大一统的中国，发展了生产，创建了伟大的东方文明，建立了完善的封建政治制度，并使之得到巩固、完善，在封建制度下使生产力发挥出最大效益，哲学和文化达到极高成就，形成封建社会自我调节的机制。也要看到，成功所在，也就是局限所在。造成今天现代化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封建制度十分完备的后果。

第二件大事，是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取消压迫，走向自主，打破专制，走向民主，建设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无前例可循，要甘冒风险。一百多年来，一代一代的先进中国人，从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派，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再到中国共产党人，都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力量。由于经验不足或措施失误，进展很大，困难和挫折也不少，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思想界的任务，就是构建反映现代化要求的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理论上的探索，奠定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中国哲学的传统，是“究天人之际”，以“内圣外王”为最高修养目标。“内圣”使人提高精神修养，培养关心人类的伟大胸怀；“外王”在于使国家太平、百姓乐业。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进行“究天人之际”的理论探讨，还是贯彻“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都要有新的内容。今天的“究天人之际”，要特别重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借鉴、吸收，来丰富和完善新的哲学体系；今天的“内圣”修养要超出修养者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而在于提高民族群体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水准。现代化的“外王”，不是小农经济的田园丰足，邦国太平，而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今天的“究天人之际”，要求哲学工作者要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要通晓诸多思想流派并做出合乎

实际的取舍。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讲的“内圣外王之道”，仅仅重视先贤语录显然不够，至少要懂得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要具备哪些条件，提高全民族的精神境界、道德素养要从何处入手。这些学问是哲学家应当熟悉却尚未熟悉的新领域。

当前许多政治评论家在评论国际形势时，经常提到两极政治消亡，国际上呈现多元（或多极）政治格局。有的学者看到目前哲学界众多学派纷纷出现同时活跃，认为学术界也是多元化。这里套用政治评论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政治家多属现实主义，他们对形势的估价和评判往往深受近期利益关系的制约。现实主义的态度使他们很少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抱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人类关怀 是哲学家的天职

在思想界呈现的思想流派的多元化，正好说明中国哲学在新境况下多方探索的现状及其不成熟。中国哲学必有一天吸取现代学问，并吸收人类一切精神成果为思想资料，构建成一个宏大思想体系，真正做到“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伟大体系，这个体系足以反映现代化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由于目前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还只是停留在准备阶段，但前景光明则毋庸置疑

新体系的完成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安定的政治环境，丰足的生活环境；

第二，完备丰富的思想资料（包括古今中外全人类文化遗产）：

第三，具备高度概括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哲学家群体的出现 。

这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要实现这些条件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作为哲学工作者，我愿在准备思想资料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后来者铺路。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历史使命召唤我们前进，我们莫辜负这个难得的机遇。以期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注释：

①古代印度缺乏文字记载，重视口头传授，他们的时间观念不及中国及西欧严格，印度古代哲学的发展，也大致和中国西欧相当。

②从秦汉到辛亥革命，二千年间基本上是统一的，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是南北朝，也只有三百多年。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方有两次北伐，北方有一次南伐，双方都有结束分裂、完成统一的愿望，由于条件不具备，没有实现

③秦始皇并不完全反对“三纲”原则。《云梦秦简》载惩治儿子不孝的刑例《绎山刻石》提倡‘孝道”。秦始皇治理百姓用刑法，教育太子、贵族用礼义。对百娃用愚民政策，对统治阶层用儒家教化。比如当扶苏接到赵高伪造的迫使他自杀的遗诏时，蒙恬知其中有阴谋，劝他写报告问明白后再死不迟。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复安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刻石表现的儒家‘三纲’思想也不少，如“合同父子”、“圣智仁义”、“六亲相保”、“男女挈诚”等（《史记·秦始皇本纪》）。

（作者单位 北京图书馆）

论中国哲学的综合创造与创造综合

成中英

一、综合的创造

庄子杂篇《天下篇》有言：“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又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这里说的一或道不是诺斯若普（Northrop)所假设的那种‘未有分别的连续体”(undifferentiated continuum），而是一个机体系统。他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开，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在这一个系统中，古代的典籍如诗、书、礼、乐、易与春秋都各有定位而为有机整体中之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再进而谈内圣外王是可行的，圣是知于一而不失其多，王是行于一而不碍于多，两者都是以道为基础来实现的，两者又是相互牵引与带动的，故名之为“内圣外王”再者，庄子认为天下的学说本来就是一源，因人失去道的眼光和整体的智慧，于是囿于短见，困于小知，最多成为一家之言所谓“天下治方术者多矣”。成为一家之言也可以无碍，只要知其可以适用的范围而不泛滥蔓衍，以小笼大，以偏概全，形成对道的整体性的歪曲和蒙蔽，自然也是合乎道之用的。但一个人如要成就大智大慧，就要超越短见与小言，经过含容深思，体会明察，才能表现道的整体观照。《天下篇》所言的庄子之学为“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其于知也弘大而辟；其于宗也，可谓调而上逐，应于化而解于物。其立不竭，其来不

悦”。并没有提到庄子如何达到此一境界，综观庄子内篇，庄子之为庄子仍是可以从其超越有限，跳出个体现点的思想方法修养来了解的。

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这一大道之学为什么在后世失落了呢？《天下篇》虽未深究，却显然以人之私（不公）与蔽（不明）而引起的。私乃只有一个狭隘的目标而一心以追求这一目标为思想与行为的动机，蔽则只看见一时一地的事实且又陷于固有的成见以及方法与层次的束缚。私与蔽又是相生相成，因而相得益彰的。因私与蔽是乃乱而失道，对于天下之异不能相通，自然也就不能“圆通合变”，不但人各“为其所欲焉，而自为方”，往而不反，因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仅仅一家之言当然不能行内圣外王之道，然如仍想一框天下，这就是天下百家彼此纷争之所由起。天下篇站在道本一源的一与道的立场对墨子、宋新、尹文、惠施与辩者三派提出批评，而对彭蒙、慎到、老冉、庄周三家则加描述而不言其短，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以其‘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却表示赞成。对于这一点，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天下篇》作者是以儒之六经体现了道的系统的，不必与道分立来讨论的。

荀子《非十二子篇》也在纪元前第四世纪末从道的观点提出了对诸子新的总结与新的批评。荀子的立场显然是儒家的，但他也赞同《天下篇》对墨子宋新惠施及辩者（如邓析等）的批评，却又提出了对道家一系（其中包括了彭蒙、慎到、庄子等）的批评，并兼及儒学子思、孟子一系。他的出发点是明道、无蔽而实用，但他的道却不像庄子的道上升到一个莫须有的倘忽境界，而是落实到社会人群的治理的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荀子所追求的是一个政治哲学或道之全与一。因之“知道”就是要了解道之为道而尽其用与变。在此立场上，荀子就很有理由在《解蔽篇》指出：“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